

大家精要





大家精要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屈原

方英敏◎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方英敏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1. 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4949-6

I. ①屈… II. ①方… III. ①屈原(约前 340 ~ 约前
278)—传记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041 号

出 版 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施国芬 程静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屈原

QU YUAN

方英敏◎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网站: <http://www.yneph.com>

(650034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ISBN 978-7-5415-4949-6

定价: 16.80 元

屈原

QU YUAN

方英敏
◎ 著

屈原（约前 340 ~ 约前 278），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是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的伟人。代表作《离骚》《九歌》和《天问》共臻屈赋瑰丽超逸的艺境。他“上下求索”“独立不迁”和“好修为常”的人格理想追求，成就了坚卓纯粹的人格美。他的横空出世，把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理想主义情怀演绎到空前的高度。他以其理想主义的精神个性为底蕴，在艺术创造和人格完善两方面，为国人开出了难以企及的境界。屈原已矣，屈原美学的精神魅力却与日月同悬。

目 录

第1章 人生之旅	001
诞生与家世	002
从文学侍臣到官至左徒	003
施展治国方略	006
身陷激烈的政治斗争	009
疏远、放逐与自沉	013
第2章 瑰丽超逸的艺境	020
浪漫主义	021
发愤抒情	030
瑰丽想象	041
“九歌”世界	053
“天问”之思	067
第3章 坚卓纯粹的人格美	077
上下求索	079



001

独立不迁	089
好修为常	100

第4章 理想主义 104

精神个性	104
以身殉道	121
主体意识	130

第5章 历史影响 139

“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140
屈骚与儒道互补	144
当代意义	147

附

年谱	152
主要著作	153
参考书目	153

第 1 章

人生之旅



001

屈原是中华美学史上的伟人，像所有的巨子那样有着丰富、多样的人格。他将民本政治家的操守与忧患、哲学家的理性与睿智和诗人的激情与想象集于一身，像一部复调的交响曲大气磅礴而撼人心魄。

在先秦诸子蜂起、群芳斗艳的时代文化氛围中，与其他诸子相比，屈原没有创立学派，亦没有抽象的政论著作和哲理语录，但他以其理想主义的生命个性和人生信仰为底蕴，演绎出瑰丽超逸的艺境和坚卓纯粹的人格美形象，从而独树“屈原美学”一帜，参与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合唱，成就了先秦美学发展过程中的惊鸿一瞥。

屈原生活在中国历史的巨变之际。一方面，先秦社会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走向统一的潮流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屈原生死于斯的楚国亦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转折。在历史走向一统大势的时风裹挟之下，楚国已是风雨飘摇，并最终为异国所吞灭。这种时代的风云际会，对生活在历史夹缝之中的中国士大夫而言，极为容易被其生性敏感的心灵



所捕捉。对中国士大夫而言，他的存在往往是吏、文合一的，即同时扮演着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角色。政治与文学是中国士大夫的血液之中的双生之质。因而，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士大夫身上显得异常纠结。他们既以政治理想诱导文学，又以文学疏导政治悲欢，从而编织出种种的人文理想。特别是历史巨变之际，政治与文学的交相摩擦，常常磁暴般引发绚丽的人文景观。屈原就是其中的一抹。楚国的历史遭际作用于他这一独特个体，从而在先秦社会接近尾声之时铸造出了悲怆的政治和绚烂的美学。

诞生与家世

屈原，名平，字原，亦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人。约生于公元前 339 年，约卒于公元前 278 年，共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王朝。战国时代的楚国地广物博，占有今湖北省全部以及湖南、河南、安徽、陕西、江苏、江西各省的一部分。屈原的家乡是楚国丹阳，今湖北省西部的秭归县。

秭归是一个巨川深谷、风光旖旎的地方。地理环境对人的精神气质应该是有影响的。譬如，长江三峡跌宕起伏的山峦、狂放奔腾的江水，与屈原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个性何其相似。因此，故乡的风土人情对屈原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形成和浪漫主义的艺术创造，应该有着密切关系。

据屈原的自述，他是“帝高阳之苗裔”，即上古高阳氏的后裔，与楚同宗。按聂石樵先生的说法，在楚国屈氏、昭氏、

景氏三大族中，屈氏受封最早，族人最盛，绵世最久；从春秋到战国，屈氏的子孙或为将，或为相，或为官，或为吏，出了不少显要人物。这种非常显赫的家世渊源对屈原成人、成才的心理暗示和激励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屈原有哪些亲属呢？据他的自述“朕皇考曰伯庸”，可知他的父亲叫伯庸，是一个很重视并具有天文历算知识的人。他以屈原的生日为吉日而欣喜，便给儿子取了个美好的名字，名正则，字灵均。取此嘉名，似乎也寄托着父亲对儿子日后养成中正、聪慧之资质的期许。屈原似有一个姐姐，名叫女嬃。据屈原自述，姐姐曾劝说他明哲保身，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传说屈原于汨罗江自沉后，他姐姐沿江哀告呼号、召唤弟弟的亡灵，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屈原应该还有妻子。据《襄阳风俗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者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叶）为粽，以五色丝缠之。”这则史料记载的是屈原妻子以粽子祭祀、悼念亡夫的故事。虽为传说，但从中推想屈原有妻子大概是可以想象的。就屈原生活的荆楚之地而言，在这一楚腰纤细、湘女多情的水乡泽国里，以屈原的才情与魅力，生命之中若没有几个钟情于他的女子，恐怕也不合乎情理。至于屈原是否还有其他的亲属，鉴于史迹渺茫，已经无从考察了。

从文学侍臣到官至左徒

屈原天资聪慧，又好修为常，后来他做了楚国兰台宫里的

一名文学侍臣。兰台宫是楚国的宫苑，遗址在今湖北省钟祥市的郢中镇中心。兰台的得名，相传起源于舜帝。在舜帝时期，汉水流域洪水泛滥。为了治理洪水，楚国先民垒筑高台、开沟引渠，疏导汉水。治水期间，楚人在汉水中游因地制宜，相继筑起三座高台以抵御洪水。舜帝南巡时，曾驻帐中台，并亲手种下兰花蕙草，并将此台取名为兰台。

楚国筑建兰台宫苑，既是作为楚王的行宫，同时又是作为官方的文艺机构，意在广纳当时的文学之士。屈原就是其中之一。据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记载，春秋以后，北方中原的群雄忙于武力征战、稳定政权、发展生存，崇尚权诈之术，对文化学术无暇留意，只有齐国和楚国，还颇有一些文化学术。齐国开通康庄大道、建造高门大屋来迎接文学之士，楚国则修筑了兰台宫苑。孟子到齐国去被奉为上宾，荀子到楚国去做了兰陵令，齐、楚两国礼纳贤才的气度可见一斑。齐、楚两国还营造了自由思想、创作的文坛学术氛围。邹衍因善谈天文而驰名，骆爽因文才而著称。屈原的作品可与日月争光，宋玉作品的文采也美如风云。他们作品之华美，甚至超过了《诗经》的篇章。可见，兰台宫苑的建造和设立确实推动了楚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兰台之地不仅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还培育了莫愁女等歌舞艺术家，把名曲《阳春》《白雪》唱遍国中，谱写了“阳春白雪”的风流佳话。

清代著名诗人毛会建曾赋诗《古兰台》赞道：

百尺兰台气象雄，披襟况有大王风；

诗人亦自分余劲，白雪歌声遍国中。

这首诗赞叹的就是当年楚地兰台人文荟萃的气象。百尺兰

台高耸，满城兰蕙芬芳，楼阁亭角错落，汉水临城而流，文人吟唱，歌舞悠扬，这是一幅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啊！

兰台宫苑作为楚王与群臣理国施政之处，和与文人兴会抒怀之地，它培育了楚文化的两代文豪——屈原和宋玉。作为文学侍臣，他们的职责就是随从楚王，或出游，或赴会，为楚王作歌赋诗，或为应对诸侯、宾客，或为陶情冶性而乐。屈原曾在《招魂》中说：“陈钟按鼓，造新歌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似乎就是追忆自己在宴会上为楚怀王作歌赋诗以配乐舞的情形。屈原之后，楚国有名的文学侍臣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其中以宋玉最为知名。相传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世人以“屈宋”并称。楚顷襄王多次在兰台游乐，当时都有宋玉随从。宋玉的《风赋》就写于兰台。

文学侍臣在战国时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诸侯王雇佣文学之士来赋诗作乐，或聊以娱乐，或点缀升平，或作为说客来开展外交活动。当时，在中原地区诸侯国的外交活动中非常流行一种外交辞令，谈判游戏规则就是“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就是通过对《诗经》断章取义、吟唱诗章来委婉表达各自的意图，以微言相感，借以沟通相互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能否熟练运用《诗经》章句来委婉传情达意，不仅关系外交目的的成功实现与否，也能反映自身素养的高下。为了不失外交礼节和风范，诸侯贵族必然雇请饱读诗书的文士作为参谋。这就为广大的文士阶层提供了机会和用武之地。

屈原的政治生涯就发轫于文学侍臣一职。后来，由于他“娴于辞令”，很快就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被提拔为左徒。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战国时代，善于辞令的士人，凭



借自己的游说而身至卿相的文士并不鲜见。如：邹忌，他鼓琴自荐，以鼓琴之理状喻治国、称霸之道，深得齐宣王的欢喜，二人交谈多日后，便被齐宣王拜为宰相。齐国任用邹忌进行改革后，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了新的气象。又如：苏秦，他出身农家，素有大志，勤奋读书。著名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是出自于他。他伏案苦读多年，受尽人情冷暖之后，终获大用，以其“合纵”之策游说于燕、齐、赵、魏、韩、楚六国之间，促成六国结盟，共同抵御秦国，成为战国时代一人而佩有六国相印的风云人物。屈原与他们一样有着相似的仕途升迁路线。他以其“明于治乱”的说辞而深得楚怀王重视，因而由一个文学侍臣一跃而为左徒。

施展治国方略

屈原升任左徒高位后，实际上迎来了他政治生命的高峰。他旋即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即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看，屈原的雄才大略有如下方面：

首先，修明法度。屈原秉承怀王“造为宪令”之命和仿效祖先创立法典的精神，拟定新的法制条文。“宪令”不仅指国之大法，而且主要内容是指法不阿贵和赏罚分明。这实际上是战国时代各国的改革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具有普遍意义。屈原在《离骚》中说：“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又说：“固时俗之工巧兮，

循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这就是对旧贵族贪婪弄权、蔑视法纪的揭露。屈原认识到，这已成为楚国的痼弊，唯有法治、赏罚分明的制度和法不阿贵的依法办事精神才是兴国之道。他在《惜往日》中说：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汎汎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他以骑马而不备辔衔、泛江海而不用舟楫来比喻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凭主观意志办事的危险性。同样在《惜往日》中，他追忆了依法治国给国家带来的新气象：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嬖。

这里屈原抒发了自己受怀王信任和继承祖制而明确法度的自豪。他依法办事，把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以至于怀王也因有他这样的“贞臣”辅佐而可以有闲暇、高枕无忧地娱乐了。

其次，举贤授能。屈原主张不拘一格、不分贵贱，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他在《离骚》中举例说：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他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如：傅说是商朝武丁时期的宰相。他从政之前，曾是一名奴隶，和许多奴隶一样做着苦役。商王武丁在位时，为了振兴国家微服私访，希望找到一位



能辅佐他的得力大臣。有一次，他偶遇奴隶傅说，发现傅说虽出身寒微，却天生聪颖、好学不倦，对国家大事颇有见地。武丁很佩服他的才识，就与之结为好友。在与傅说相处期间，武丁学到了不少治国的知识和本领，并排除阻挠而拔擢傅说为宰相。吕望、宁戚与傅说一样，都是出身卑微而身致卿相的典型。从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中，屈原坚定了自己举贤授能的政治理念。

举贤授能所要反对的就是世卿世禄的制度。世卿世禄制是与血缘宗法制统治相联系的官员选拔任免制度，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官职和享受俸禄，它的核心就是确保统治阶层将统治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族人手中。这一制度发端于夏代，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存关系的发展，仅仅靠血缘家族内部的人员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统治，它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并出现瓦解趋势。战国以来，无论是李悝的“食有劳而禄有功”、吴起的“废公族疏远者”，还是商鞅的军功入爵，其改革矛头都直指世卿世禄制，以保证有能力的王族之外的人进入官僚管理层。屈原虽然出身于楚国贵族，但他看到贵族的没落与新兴士族的兴起已势不可挡。他强调举贤授能，吸收新的阶层成员来革新政治。因此，他举贤授能的改革措施和要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最后，合纵抗秦。这是屈原支持的外交主张。屈原生活的时代，战国七雄的争霸斗争已进入尾声阶段，大一统已经成为历史必然。各国相继经过变法改革后，形成了三股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政治实力：秦、齐和楚。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国与秦国又成为列强之中最有资格担当起统一大任的国家。于是，“合纵”与“连横”的策略应运而生，它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所

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军事策略。当时，最为知名的纵横家有苏秦和张仪。所谓“合纵”就是南北燕、齐、魏、赵、韩、楚六国联合成一条纵线，共同对付西部的秦国。所谓“连横”就是秦国与东方六国中的某一国家结盟，形成一条东西向的横线，来进攻另一个国家。当时，“合纵”策略由苏秦倡导，以对抗秦。“连横”策略由张仪策划，以拆散合纵为目的，来瓦解秦的敌对联盟。对于楚、秦两国而言，“合纵”与“连横”都是颇具现实感的策略。只要各自的策略能够有效地付诸实施，那么一统天下的伟业对双方都是有可能的。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正是指的这一局势。在合纵抗秦的方针下，屈原曾成功地使楚国与齐国结成了联盟，延缓了强秦兼并的步伐，并为楚国的强国计划赢得了时间。

屈原的内政、外交韬略是颇具现实感的，并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若能够贯彻始终，以楚国当时的实力，或许最终一统天下的就未必是秦国。

身陷激烈的政治斗争

但是屈原生不逢时。这是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楚国漆黑一团的腐败政治使得屈原的内政、外交韬略并未得到一以贯之的实施，甚至改弦更张，被弄得面目全非。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它必然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并遭到旧势力的阻挠。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是任何改革难以避免的。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任左徒后，深得怀王的信任，“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按金开诚先生的说法，这件事实际上是一场重大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子。

应该看到，屈原与上官大夫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利益冲突。所谓上官大夫夺稿，屈原不与，若从字面意思看，是说上官大夫想夺取宪令的稿件，屈原不给他，有点近似儿童之间你抢我夺的嬉闹。但实际上，它是一场严肃、残酷的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深刻斗争的一个缩影。司马迁不过是以举重若轻的文学笔法来描绘了它。

前面讲到，心怀政治理想的屈原，在内政上提倡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在外交上，坚持联齐抗秦政策。应该说，屈原的政治主张符合楚国的长远利益，楚人理所当然应该支持，但它却触动了贵族阶层的既得利益。以上官大夫、公子子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正是在自身政治及经济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下，相继成为屈原的政敌。常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俗人之间都常常为自己的一己之利益得失闹得不可开交，何况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呢？

屈原的改革并非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它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必然要引起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屈原新政所触动的并非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楚国整个旧贵族集团的利益。无论是修明法度还是举贤授能，这些改革措施在战国时代各国的变法中都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的。屈原新政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对旧贵族利益集团触动的尖锐性，不但上官大夫、子兰受不了，连支持他改革的怀王也变得犹疑